



王汎森 著

# 傅斯年：

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  
中的个体生命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傅斯年：

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  
中的个体生命

王汎森 著

王晓冰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by Wang, Fan-se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521-03047-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 王汎森著；  
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5

ISBN 978-7-108-03503-5

I. ①傅…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傅斯年 (1896~1950)  
—人物研究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816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

201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25.25

字 数 280千字 插图25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45.00元

## 中译本序

这是廿几年前写的一本书稿，正式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

廿几年前，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余英时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请学校时的研究计划一个是战国到秦的思想转折，一个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当时甫自耶鲁转来，见面之后便说，他认为我应该用傅斯年为题写博士论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从未有专书。

为了写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国念书的旧笔记，居然发现我于1987年9月10日在普林斯顿帕玛堂与余英时老师的一段谈话记录：

下午与余老师谈，老师见面便建议我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他说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回答说这些档案资料太过零碎，余老师说无论如何总能够整理出一个脉络来，而且可以与我先前写过的两本书（案：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1987年出版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相联。

就这样，我放弃了原先准备研究的题目，改作傅斯年。

在写这部论文的过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中的观点，如果想了解其学术观点的人，自然会去读他的原书，要紧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我基本上遵守了这一个指导原则。所以虽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许多见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并未大量复述他的文章。

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传记必然要包括许多有趣的事件与交往情形，但此书对这方面的细节都尽可能地割舍了，除非它们能彰显历史的意义。生活传记方面的工作应该留给对傅氏的生平有兴趣的朋友来做，或是用一部年谱长编来表达。再者，此书是以英文撰写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体例，它必须围绕一个或几个 themes 来进行。所以此书是在一定的脉络之下开展，逸出这个脉络，或安排进去显得太臃肿的部分，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书之后，我又陆续写过几篇补充性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前三篇已收入本书的附论）——

一、《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二、《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三、《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

四、《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大概是在普林斯顿读书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罗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的《历史叙述的复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后来我也听过他有关 16 世纪欧洲的课。史东这一篇文章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责现代历史书大多不堪卒读，忘记了历史家本来的身份便是故事讲述者。他批判了年鉴学派史学，批判了新经济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微词，提倡一种以问题为主干，但又不失叙事味的历史写作。

此书的写作方式多少受到史东的感染，故希望它是问题取向的，但同时也是可读的。不管我成功地做到几分，但我在下笔时比较含蓄，对当时心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未尽情地叙出，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此能有理解。

时间过得真快，离本书初稿写成已有二十几年。在我着手写这本书时，中外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一本以傅斯年为主题的专书。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几篇学位论文，但最后都没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时仅有一部参考文献是 Alan Moller 一本题为 “Bellicose Nationalist

of Republican China: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u Ssu-nien”（《中国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的博士论文。此书写到一半时，聊城师大历史系教授合写的《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才出现。现在，有关傅斯年的中文书已经很多。这都是这十几年来的新荣景。

除了交代撰写本书的因缘外，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记下一些零星的想法。

我认为，傅斯年处于“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关于他的讨论就不能不与这三者有关。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我的书出版之后，《美国历史评论》中有一篇书评，作者相当明快地指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它在讲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陷入的种种“两难”（Edmund S. K. Fu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2），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人们失去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蓝图”（blueprint），这种困境反映在许多青年人迷惘、自杀的事例上。没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们，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1888年出版的剧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说的：“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生活在过渡的时代里，因此我把他们写成是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

但后传统时代也是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个各种论述相互角逐，并试图成为“领导性论述”（leading discourse）的时候。从1911年起，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而新文化运动脱颖而出，傅斯年在其间扮演着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

他们当时奋战的对象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还不大能熟练地掌握新型传播媒体及横向组织，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开始组团体、办报刊，推展各种活动来与新派相抗。这时候谁的论点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逐渐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应”，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

“领导性论述”在形成“群聚效应”之后，它便开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时也吸引一大批靠着向“领导性论述”靠拢而获得利益的人，许多在各地响应这种领导性思想论述的人，逐步以之成为身份上升甚至谋食之阶。新思想一旦获得“群聚效应”，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类似科举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论时，大量清季的经世致用之书成为敏感读书人科场得意的上升之阶一样，不管动机如何，它们都帮助新思潮的迅速传播。

傅斯年是“后科举时代”的人。对于读书人而言，科举的废除是危机，但同时也代表着各种新的可能性，至少读书人不必再局限于读书做官这一条窄路，他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职业。家里门口的一条河，可能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天险，但也可以是航向天涯的机会。

科举废除，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用什么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社会的菁英？过去在科举传统中，答案相当简单明确——考场上的文章是一个清楚的“传讯”媒介，可以决定谁是菁英。现在“菁英”的范围显然变得多元了，但还有一层更重要，现在人们正在摸索什么可以成为新的“传讯”媒介？拥有外国学位的人，身上握有强大物理力量的人，在公共领域中（包括新型的报刊杂志）成为领袖的人，或者是在社会空间中进行横向联系，成为社团、政团的领袖，或者在地方上成为豪霸，或者是成为新学术、思想的领袖等，不一而足。

而傅斯年与胡适等一批新知识分子，很快地成为学术文化的领导菁英。问题是新思想、新学术的领袖所鼓吹的东西五花八门，为

什么以胡适、傅斯年为主体的这一派会取得优势，何以胡、傅所领导的带有实证论色彩的历史考证学派会成为一代之主流？这当然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解释。我在这本书中也曾谈到这一点。书中提到，他们都熟悉并深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比较能欣赏清代考证学所展现的某种与西方现代学术能够接榫的重证据、推论严谨的“科学”精神，所以相当自然地以“新汉学”为津梁去接引现代西方学术。此外，他们大都不满于中国近世思想传统中过度重视心性及内省论的倾向，以及太过含糊笼统的思想方式，所以倾向以谨严而确定的知识系统来医治中国思想学术上的痼疾。当时西方流行的实证主义、语言考证学派成了相当妥当的选择。

不过，如果摆在“后传统时代”来看，在那样一个失去规范的时代，人们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观而确定的东西，而拒绝充满问题和紧张的（诸如 Weber）思想体系，以重新稳住崩解的秩序。这种心理也部分地解释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这些人虽然在德国念书，却与当时德国学术界争论得相当热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有一场大辩论，重“理论”的风气已经占据主流地位（参见 Lawrence A. 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但是傅斯年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痕迹，反倒是选择了轻理论重实证的语言考证学派。

不过他们并不是清代学者简单的重复，虽然与清学有延承之处，但他们的“学术心态”并不一样。他们对“学术”是什么，“史料”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乃至史家的社会角色、政治功能，以及“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种“心态丛聚”，在这些“心态丛聚”方面他们与清代学者或是传统“文人”之间已经决裂了。我们已经相当熟悉傅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新思潮的倡导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极少留意他对现代学术的看法其实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看法，并且有意识且有系统地想加以改造。他有力地批判、改造旧文



人的历史文化。

傅斯年是“后古史辨时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当细致的看法。我在本书中提到他把古史辨运动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起来。这个态度，如果只读傅斯年的全集，其实不大能够清楚地看出，我虽然早已从他字里行间看出这一点，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他用极为潦草的字体所写的一篇讽刺顾颉刚的小说（见本书之“附录一”），才确定下来。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写从疑古到重建之过程，而且也提到，这是后来学界脱离古史辨派影响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后经学时代”的学者。他是从“经学时代”到“史学时代”的转折性人物，自汉代以来，所有的经学观点所建立的静止的中国世界观被以史料为中心建立的变动与发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从而也是现代世界）取代了。同时因为他倡导“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使现代专业化史学得以生根，但因此引来传统派史家与左派史家猛烈的攻击，同时造成历史知识之社会功能与史学之社会角色的变化。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时，傅斯年刻意扬弃内省论式的思维传统，主张“国民训练”，主张“约律主义”，反对以内省式的道德哲学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我不敢确定傅斯年是否读过康德在1795年所写的有关历史目的论的论文，但是他的论点却有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一项指导性规划》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认为未来社会的进步是靠着使人人成为圣人，或是宋明理学中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或毛泽东《送瘟神》中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他与陈独秀都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反讽——当人们生活在野蛮社会时，需要发展一套规则体系来限制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限制和规范又有助于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因为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无休止地斗下去，所以必须要坐下来制定各种规范，社会因而往前推进

一步。这与中国内省的思想传统正好相异。

这本英文书的书稿早在 1992 年底已经完成，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接受出版。但是因为我的研究兴趣已经不在这里，所以直到 2000 年才将手边放了多年的校样寄回。我常对朋友开玩笑，我有“心理障碍”。对我而言，校稿比写稿还难，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刚刚写定那一刹那，我已经对写出的东西感到不满意了。也因为这个“校稿症候群”，此书中译稿在 2001 年左右完成，但我竟一搁将近十年，对原译者及安排此事的友人，深感歉疚。

最后我要感谢以下诸位：译者王晓冰女士、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刘东先生、三联书店的孙晓林女士，他（她）们促成了这个译本的出现。此外，我的好友罗志田教授及其学生、陈正国教授、潘光哲教授在我因“心理障碍”未能看译稿时，代我校订译文。志田兄、刘东兄和山东的马亮宽教授多年来一再催促，使我不能再原地踏步。没有他们的帮忙，这个译本决不可能完成。

王汎森于台北

2002. 6. 6

2010. 5. 4 修改

## 鸣 谢

这本书若没有许多人的慷慨帮助是难以完成的。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余英时先生。感谢他在1987至1992年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时给予的不倦指导、启示和关怀。我深深感激张灏教授对拙作的有益建议，感谢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詹森（Marius Jansen）、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周质平、墨子刻（Thomas Metzger）诸教授及已故刘子健教授的宝贵指教。

本书写作期间，我的朋友 David C. Wright、Markus Keller、冀小斌、John Kieschnick 及我的英文教师 Jeremiah Finch 教授帮助我润色英文，我的朋友 Peter Zarrow、David Wright、Axel Schneider 和王晴佳在手稿准备期间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剑桥出版社的编辑 Brian MacDonald 在定稿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如果没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事们的帮助，这个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要感谢管东贵教授。

最末却非微末，要感谢我的妻子文芳，她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难以言表。

## 缩 略 语

中 共：中国共产党

《全集》：《傅斯年全集》，台北，1980年

傅 档：傅斯年档案，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国民党：中国国民党

# 目 次

中译本序	1
鸣 谢	8
缩略语	9
导 论 1895 年后的思潮与傅斯年	1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知识界的地位	5
第一章 傅斯年的早年	12
家乡：濒于崩溃边缘的旧社会	12
傅斯年的成长历程	16
北大岁月	20
傅斯年和《新潮》	30
作为五四游行示威主将的傅斯年	33
年轻的叛逆者	36
作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38
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42
传统学术的再评估	44
创造一个“社会”	46
“一团矛盾”	52
第二章 新历史学派的形塑	60
在伦敦和柏林的学习	60

傅斯年与史语所 \_\_\_\_\_ 75

史语所的眼界和目标 \_\_\_\_\_ 83

史语所的工作 \_\_\_\_\_ 92

### 第三章 走向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

中国古史的学说 ..... 112

中国古史起源多元论 \_\_\_\_\_ 115

重建中国古代史 \_\_\_\_\_ 128

傅斯年学说的影响 \_\_\_\_\_ 135

### 第四章 反内省的道德哲学 ..... 140

反内省传统的出现 \_\_\_\_\_ 141

古代道德哲学的去伦理化 \_\_\_\_\_ 145

终结内省的道德传统 \_\_\_\_\_ 146

###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负担 ..... 156

历史与政治 \_\_\_\_\_ 156

《东北史纲》 \_\_\_\_\_ 166

文化认同的需求 \_\_\_\_\_ 170

爱国主义与反传统 \_\_\_\_\_ 174

政治选择 \_\_\_\_\_ 177

### 第六章 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 ..... 184

政府不端行为的批判者 \_\_\_\_\_ 191

对民族往昔的两难心理 \_\_\_\_\_ 198

平抑昆明学生运动 \_\_\_\_\_ 201

惩治汉奸 \_\_\_\_\_ 204

“清流” \_\_\_\_\_ 207

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和台大 \_\_\_\_\_ 215

寻找道德之源 \_\_\_\_\_ 220

结 语 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	228
附录一 攻击顾颉刚的小说片段 .....	238
附录二 傅斯年与陈布雷笔谈记录 .....	240
参考书目 .....	241

## 附论六篇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	267
胡适与傅斯年 .....	290
伯希和与傅斯年 .....	296
傅斯年与陈寅恪 .....	319
——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	328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 .....	363
——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全集》总目录 .....	380

## 导论：1895 年后的思潮与傅斯年

傅斯年出生的 1896 年，中国尚处于刚刚过去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余波之中。那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战败于日本手下实在令人震惊，给傅斯年及其同时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年轻的梁启超（1873—1929）已亲身体会到这次震惊带来的冲击，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后果是“粉碎了中国两千年之大梦”，〔1〕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失败，但败在日本手里却是创巨痛深的。毕竟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在中国人眼中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影响之下，且其开始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改革还在中国之后呢。

甲午之后，巨变接踵而至，各类中国知识分子也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895 年，革命派领袖孙中山（1866—1925）认为日本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难以预料之事。1894 年冬，在中国刚刚遭受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他即决定组织他的第一个反满团体——兴中会。后来成为改革派领袖的康有为（1858—1927）则召集在北京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促使皇帝进行改革。知识分子领袖严复（1854—1921）发表了四篇划时代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严氏后来以向中国译介欧洲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哲学著称，他在 1895 年着手从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汉译工作，这本译名为《天演论》的书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

---

〔1〕 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台北，1958 年），第 24 页。



物。<sup>[1]</sup>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牺牲者的谭嗣同（1865—1898）则在1894—1895年间决心放弃传统文士的生活方式。<sup>[2]</sup>

中国知识界的新发展形塑了傅斯年的知识体系结构。首先是思想观念的激进化。一些人促成了这种现象的出现。严复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之间划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线，他极力主张中国已远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领域。这种责难使此前对自身文化特别自豪的中国人甚感惊讶。<sup>[3]</sup>谭嗣同批评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康有为几乎将过去两千年的学术通通贬为“伪学”。章炳麟（1869—1936）无情地批判了儒家的人格。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已经过时，因为它们全都与现代公民所需的公德无关。<sup>[4]</sup>

但是，许多社会和政治体系仍支撑着传统的价值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制、儒家礼仪、经典教育、科举制和法律制度。虽然晚清时激进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只有在上述五个支柱全都崩溃之后，知识界的革命才真正开始：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学生不必祭孔，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废除。

1895年后被大肆诋毁的传统价值体系，曾经是个相当和谐统一的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崩溃后，原来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走向直接对抗或相互竞争。

知识界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是新知识群体的形成，他们由效忠于

---

[1] 见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New York, 1969), p. 43, 91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纽约，1969年，第43、91页)。

[2] 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台北，1980年），第14—19页。

[3] 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1979年），第249—285页。

[4] 同上书，尤其是关于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的章节。也见王汎森：《章太炎（炳麟）的思想》（台北，1985年），第185—189页，以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1987年），第2—3章。